

中国独立阅读报告

2007 年 7 月

细则

- 1、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2、自 2007 年 7 月 1 日起，阅读报告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3、阅读报告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4、阅读报告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
- 5、阅读报告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阅读报告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阅读报告小组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

作者名单

执行编辑：苏小和、王晓渔、成庆

观察员：写作：戴新伟（广州）

经济：苏小和（北京）

思想：成庆（上海）

文史：王晓渔（上海）

书评人：羽良（北京）

推荐

[苏]列昂尼德·茨普金:《巴登夏日》, 万丽娜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07 年 5 月, 18 元。

一部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致敬之作。

[以]阿米亥:《开·闭·开》, 黄福海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年 4 月, 20 元。

一部没有大词的史诗。

赵迺抃:《欧美经济学史》, 东方出版社, 2007 年 5 月, 68 元。

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探索到目前为止, 可能已经形成了普适性的规律。赵迺抃先生的《欧美经济学史》用他毕生的研究演示了这一点。

吴晓莲:《我和爸爸吴敬琏:一个家族鲜为人知的故事》,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7 年 6 月, 26 元。

一个家庭的小历史演义。

[英]诺曼·莱布雷希特:《音乐逸事》, 盛韵译, 三联书店, 2007 年 3 月, 39.8 元。

一本极佳的马桶或床头读物。

[美]阿伦特:《论革命》, 陈周旺译, 译林出版社, 2007 年 3 月, 19.5 元。

比较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的经典著作。

唐小兵:《再解读: 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6 月, 32 元;

一部冲击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迟到之作。

曹乃谦:《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7 年 4 月, 24 元

不一定是中国最好的作家, 大概是中国警察中最好的作家。

桑格格:《小时候》, 新星出版社, 2007 年 5 月, 28 元

关于青春记忆的快意文字。

[美]卡尔·休斯克:《世纪末的维也纳》, 李锋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5 月, 28 元

如果说什么地方能被说成是代表作为 20 世纪开端的西欧精神世界的话, 那么, 它就是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

独立阅读报告

WRITING 写作

观察员 戴新伟 (广州, yukon1944@yahoo.com.cn)

广州六月底酷热, 翻检一月所读, 却不能归咎于天气。有些有名气有意思的文学作品, 照例还是要读一读。2006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早年的小说《黑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6 月) 刚刚推出中文版本, 这部小说读了一半, 再次坚定了我对帕慕克的想法: 他的确是一位“挂羊头卖狗肉”的作家。《黑书》的故事背景, 当然不得不提帕慕克对于伊斯坦布尔的描写, 这一点可以结合他的回忆录《伊斯坦布尔: 一座城市的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4 月) 来谈马悦然所谓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与乔伊斯的都柏林这样的类比。然而我更感兴趣的, 还是帕慕克小说中的侦探/推理小说结构的痕迹。

前不久出版的中文版《雪》(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5 月), 被全世界都称之为政治小说, 其结构上和之前我们读到的《我的名字叫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以及现在读到的《黑书》都有极其雷同之处, 就是作家本人的悬念设置: 《我的名字叫红》要揭示凶手是谁, 《雪》要揭示诗人卡的结局(尤其是在穿插进叙述者的角度之后), 而《黑书》则是律师卡利普妻子的生死。这个特点, 似乎也不仅仅是帕慕克的趣味问题, 我更愿意视之为帕慕克小说之所以“好读”的原因, 但同时也是他作为当代小说家不同于 19 世纪作家之处: 对侦探小说结构的运用(多么容易让人想起多产有趣的格雷厄姆·格林), 对世俗杂闻的运用(《雪》中边境小城卡尔斯的报纸新闻、叙述者找到的录像带), 讲故事的套路不再是单一的叙述而是多角度。一言以蔽之, 讲故事在帕慕克这里只是同名花招, 不少章节乃是为了整体结构而做必要的“填充”——如果搁在 19 世纪的作家那里, 这些章节会在他们彪悍的叙事下碾个粉碎。帕慕克小说骨子里还是玩 20 世纪小说的技巧。读帕慕克的小说, 琢磨他的叙事结构, 让人想起法国作家克劳德·西蒙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谈写作(参见《弗兰德公路》附录, 漓江出版社, 1987 年), 他以不同颜色的铅笔勾勒故事的情节、脉络等——你看帕慕克在《雪》里关于地点、关于人物命名、关于那 19 首诗歌的出现, 等等, 都和克劳德·西蒙的颜色论不谋而合。

有意思的是, 2007 年 6 月初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首届土耳其文学译者、出版商国际论坛, 据闻有土耳其作家直言帕慕克的语言很差。如果我们对照台湾的英文版本翻译和大陆的土耳其版本翻译, 这两个中文版本的确没有太大的走样(以《我的名字叫红》为例)。又如《雪》, 我最好奇的是, 帕慕克花了那么心思编排出来的 19 首诗歌, 却没有一首完整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塔尔科夫斯基却在自己的电影里用了老爸写的诗歌, 而且质量不差)。这也是“语言很差”之一例? 至少我们可以说, 从文字上看, 帕慕克的确没有太多诗人的特质。



除了帕慕克这样高知名度的作家外, 最近一本苏联作家列昂尼德·茨普金所写的长篇小说《巴登夏日》(南海出版公司, 2007 年 5 月) 引人注目。版权页上的俄国国籍并不准确, 作者去世前苏联尚存, 但“苏联作家”的表述也不准确, 因为他在世之日是以科学家的身份为人所知, 他跟当时的文坛并无联系, 根本不是作家, 终其一生, 茨普金都是一个苏联人。这部写给抽屉的小说, 乃是在他去世前一个星期在美国的俄民侨报上刊登, 不用说, 手稿也是被秘密带出境的。小说出版后, 被苏珊·桑塔格发现、发掘。因此, 关于此书的种种背景, 其实读苏珊·桑塔格所写的序言就一目了然, 比如, 并非一切因为政治原因而不能发表的作品, 其所有价值都是“政治原因”! 苏珊·桑塔格让我们知道, 如果那是文学, 就有其作为文学本身的价值, 茨普金所面对的, 不是玩票, 而是文学本身。但读小说, 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些苏珊·桑塔格所未曾注意之处, 比如, 这部小说在叙述上夹杂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妻欧游路线(其中大部分是由陀氏夫人的日记情节引起)与作者本人的游历情节, 在写作意图上乃是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致敬之

作, 作者是如何剔除了被影响的焦虑: 仿写、过于崇敬的描写以及自我神话? 这其实也同样证明着列昂尼德·茨普金作品的文学价值所在。有趣的是, 除了列昂尼德·茨普金这样一生未出过苏联版图的作家, 最近还有俄国侨民作家也值得留意: 《手提箱》(人民文学, 2005 年) 的作者多甫拉托夫的另一本小说《我们一家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年 3 月) 出版,

也是一本描写苏联事情一家人命运的故事。

很难忘记趋势大师托马斯·弗里德曼还是记者时，对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亥的拜访（《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诗人的忧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读傅浩翻译的上下册《耶胡达·阿米亥诗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也获益良多，当然，有此背景，新近翻译出版的阿米亥诗集《开·闭·开》（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4月）则不可不读。上海译文出版社近年的“以色列文学丛书”可谓越出越好，之前的《蓝山》（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和《证之于：爱》（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都给我留下了极其爽口的回忆。这本诗集所选都是阿米亥的长诗，是一部没有大词的史诗。只是《开·闭·开》这个名字多少有点“硬译”，不知如何才能反映出阿米亥诗歌里的历史典故之感？值得一提的还有《周煦良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1月），洋洋7卷，他自己的创作只有一卷（《舟车集》），其余都是译作。在著名的《刀锋》、《福尔赛世家》等译作中，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西罗普郡少年》，英国诗人霍思曼的诗集。此书曾经在1983年列入湖南人民的“诗苑译林”出版，绝版已久，但作为“19世纪90年代露头角的三大诗人之一”（另外两位是哈代和叶芝），霍思曼却未拥有哈代和叶芝那般的声誉。周煦良先生的译笔，充分表达出了《西罗普郡少年》的慷慨达观和坚忍的斯多葛精神，也与英国小说家、批评家J·B·普里斯特利对霍思曼诗歌的评价不谋而合，后者评价说：霍思曼的诗，一出手就成熟（参见《普里斯特利散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



孙惠芬《吉宽的马车》（作家出版社，2007年5月）是我一个月来断断续续读的书。老实说，国内的当代小说家，如果不是名声、噱头，谁会耐烦捧读板砖厚的小说？但孙惠芬的这部小说，长则长矣，却能在开头就显示与众不同，假如不幸你对于文学作品有着比较特殊的挑剔/爱好。主人翁吉宽是个懒汉，他周围的男人们都去城里打工了，而他却独爱乡下的生活，宁愿做一条《昆虫记》里的虫子。这种懒惰的思想，这种不求上进的生活态度，其实正是当下生活的另一面，只是我们看到的太少。这部小说语言非常的不一样，叙事上非常舒缓，整个故事像一个懒散乡下的传奇，处处显示出作家的不同禀赋。我之前并没有读过这位作家的小说，但《吉宽的马车》读了3章之后，我去孔夫子订了一册她的散文集《街与道的宗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不过，舒缓的同时却使得小说如同工笔画——并不使人厌烦，现在出版的很多国内小说，是过于粗糙需要冷处理，删改，孙惠芬的这本小说只是作为文本而言，显得太冗长了。

ECONOMICS&SOCIETY 经济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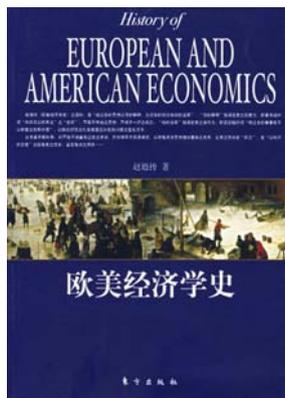
观察员 苏小和（北京，susumartin@hotmail.com）

我读经济学，历来喜欢为当下所用，这种稍微有些庸俗、功利的阅读姿态，让我对经济学的理论味道总是隔靴搔痒，但却也由此找到了很多解读当下的经济学方法。

比如现在，坏消息总是纷至沓来。我们眼见的宗庆后高举伟大的爱国主义旗帜，决计要将不平等条约彻底废除，八国联军早已经不在了，想来宗庆后的底气不仅与人民币有关，也与大国崛起有关。而山西黑砖窑事件更是让我心烦意乱，那么多身份不明的农民工和孩子被关在砖窑里，没日没夜地干活，想打就打，想杀就杀，有人视而不见，有人见怪不怪。领导上终于惊动了，挥手之间，问题似乎就解决了。还比如政府半夜时分宣布提高印花税率，第二天早上起来股民们的眼睛都有点傻了。

这真是一个热闹有余的季节！骂娘的骂娘，哭泣的哭泣，讲道理的讲道理，不讲道理的，也只能继续不讲道理。如此景况，放在欧美、韩国、日本，或者是香港和台湾，人们早就上街游行去了，但内地的人都知道政策不允许，也懒得折腾，大家有钱继续消费就够了。高度管制的大国经济如此闹腾，可能让领导上匪夷所思，但对于一个熟悉经济学史的读书人而言，这却是必然之局面。赵迺转的《欧美经济史》（东方出版社，2007年5月）开头就讲重商主义，一直讲到连带责任主义之思想。我读了此书，用振聋发聩来形容并不为过，我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制度设计之落后震撼，我以为我们目前还处在重商主义时代。重商主义制度最初出现在15-19世纪的欧洲，并成为当时普遍的国家经济政策。最经典的重商主义国家包括了英

格兰、法兰西、西班牙和俄罗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词典》解释为：“重商主义是政治经济理论体系，它是政府对于民族的特征进行调节，使国家获得经济方面的收益和福利。”现在看来，在重商主义盛行的国家，国家的各个方面都有政府高度管理和调节，而政府本身要依赖于各种利益集团，后者相应地从政府那里获得各种有利条件。



有意思的是，当年的重商主义国家都曾经呼喊过大国崛起。

对于这种具有非常明显垄断特征的经济制度，马克思和亚当·斯密都曾经强烈批评过。这是一种被政治严加管理的经济体制，经济学家查尔斯·威尔逊说，重商主义制度由政府发布的各种政策、立法、规章、手段构成，尽管国家主体仍然属于农业社会，但却急于把自身转变成贸易和工业社会。历史证明，这种看似宏大的经济体制导致了一系列病态的经济学现象：首先是法律体制的过渡干涉，其次是无所不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最后是各种利益集团几乎绑架了国家。

重商主义的细节我们耳熟能详。比如立法带有独裁主义性质；比如政府经常站出来，直接进行经济干预；比如，与政府没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和个人，难以进入有效益的经济领域；比如，政府各部门办事效率低下。还比如，人们对财富的抢夺越过了人性底线。

历史的发展轨迹让我们惊出一身冷汗。欧洲的重商主义制度已经消失了几百年，但是我们似乎还迷恋在这种早已证明是失败的经济制度里。这说明，我们的经济制度建设才刚刚开始，后面的道路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很多。

重商主义的破落，乃是一种经济学的必然，但他破落之后的几种方向却大相径庭，一种导向了竞争的市场经济，一种导向了共产主义国家所有制。前者以英国为圭臬，而后者则以俄罗斯朝着苏联社会主义的迈进为代表。有意思的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仍然在高效率的发展，而苏联经济已然崩溃，新俄罗斯当下正处在巨大的变迁之中。

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探索到目前为止，可能已经形成了普适性的规律。赵迺抃先生的《欧美经济学史》用他毕生的研究演示了这一点。这本书的出现，正可谓是正逢其时，对于那些憋足了劲头要探索新经济制度的领导而言，赵先生的书是个不错的提醒。我们不应该在某些乌有的意识形态之下，用特色之名抵御常识，我们可能只需要认同规律，尊重历史。

读完了赵迺抃《欧美经济学史》，接下来我仔细阅读的，是阿马迪娅·森。森的著作一直是我阅读的重中之重，《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1月），本书是他的两本论述不平等问题的专著《论经济不平等》和《不平等之再考察》的合集。《论经济不平等》主要阐述了如何看待有关不平等测度的概念框架及实践层面上的测度问题，对从哲学假设、经济内容和统计要求等角度来测度经济不平等的其他方法进行了评价，讨论了与之相关的分配原则问题，并对有关经济不平等、贫穷问题、福利经济等问题做了详尽的论述；《不平等之再考察》是对不平等进行的重新审视，分析了平等的本质，探讨了研究不平等问题的一般方法论意义上的分析思路，探求了在务实层面上如何评价社会制度安排的分析方法，并提供了一种衡量平等和不平等的具体方法——能力观。

中国当前的不平等空问题空前，读森的书可能让你开始理性思考，有权柄、且想有所作为的人可能会着手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方案。

阿维纳什·迪克希特的《法律缺失与经济学：可供选择的经济治理方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是一本对当代中国经济建设恰到好处的好书。阿维纳什认为，在法律缺失或低效的国家存在这样的问题：如何（有效）保护产权和怎样保证合同的执行？来自于发达市场经济的企业如何在此种环境下从事商业活动？阿维纳什研究了一种私立秩序理论，这种私立秩序超越或补充了来自于政府的弱经济治理模式。伦敦经济学院认为这本极为优秀的著作清晰而全面地探讨了经济学中一个新兴领域，即研究非仁政国家中的交换、合同及产权实施的问题。

罗伯特·M·弗格尔森的《布尔乔亚的恶梦，1870-1930年的美国城市郊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讲述的是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体制衡问题。美国城市郊区具有田园诗一般的吸引力，有舒适的住房，整齐的草坪，绿阴如盖的街道。它寄托了居民的梦想，又映出了他们的恶梦；既体现了他们的希望，也体现了他们的恐惧，他们害怕邻居，害怕少数族裔和低收入群体；他们害怕自己，害怕市场，更害怕改变。福格尔森通过对长期以来为人所忽视的城郊住宅小区限制性契约的研究，揭示了这些恐惧的根源。

显然，本书的视角对中国当下风起云涌的城市化进程有所启示。

罗伯特希勒的《市场波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是我最近关注的经济学著作里最具有专业深度的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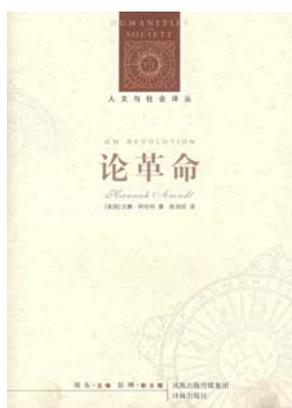
作，详细论述了如何运用数学分析和行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公司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土地市场、商业组织市场、商品市场、可收藏品市场和外汇市场等投机市场中的价格波动进行研究。圈子里的人不提这本书似乎是没有面子的事情，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结合他的《非理性繁荣》一起阅读。

最后一本被我关注的书，就是吴晓莲的《我和爸爸吴敬琏：一个家族鲜为人知的故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6月），事实上这本书应该算是一本人物传记，或者是一个家庭的小历史演义。因为与吴敬琏先生有关，所以被我列在经济学著作里。中国当代经济学从顾准开始，依靠吴敬琏先生传承，正在向未来延伸，我的敬意就在这里，既有对顾准先生深深的怀念，也祝愿吴敬琏先生健康长寿，经济学精神永存。



THOUGHT&PHILOSOPHY 思想哲学

观察员 成庆（上海，veron.cq@gmail.com）



沃格林（Eric Voegelin）在分析马克思的革命观念时，曾写过一句非常简短的结论：“震惊世界的就是这些观念。”观念的力量最终要体现，虽然常常需要大规模的政治社会运动结果才能最终证实，但是很少人注意到，阅读其实是这些观念力量的起跑线，当年在大英图书馆苦读的马克思，最终推动了一场影响深远的革命运动，由此看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图书馆，也是某种意义上现代中国革命运动的精神策源地。初看起来平凡无奇的阅读，最终却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蝴蝶效应”，这本来就让阅读增添了几份神秘的趣味。

要了解现代革命运动如何发生，我们或许还是得借助阅读，才能了解背后的历史奥秘。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至今还未在大陆出版过，尽管台湾早就有了大陆译者林骧华的译本，不过传闻三联书店将在近期出版，不过从翻译出版的角度来看，她的著作洋洋数卷都陆续在国内付梓出版，蔚为大观。其中2006年推出的《黑暗时代的人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精神生活·思维》（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以及《精神生活·意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都是阿伦特晚期比较重要的著作。

2007年3月以来，又有两本阿伦特的书稿出版，一本是《论革命》（译林出版社，2007年3月），另一本则是《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后一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著作，而是1953年她在普林斯顿大学开设讲座的手稿。《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试图反思马克思对欧洲思想传统的一个改造，将劳动作为政治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提出来，从而为暴力革命提供了哲学上的基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从这个线索出发，《论革命》这本书中关于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的思想源流，也可以自然可以很好的得到理解。不过需要提及的是，两书的译笔都算流利，但是略显遗憾的是，孙传钊先生的译文虽然比较符合原义，但是或许是因为阿伦特的德语式文风，选词遣句略显拘谨。

《世纪末的维也纳》（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的作者卡尔·休斯克（Carl E. Schorske）可谓大名鼎鼎，他虽是出生在纽约，却是地道的日耳曼裔。而他为什么会进入德奥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领域，竟也和他这个身份有关。他曾经回忆道，他小时候在课堂上演唱一首悼念德国士兵的歌曲，但是那是在1919年，美国人对于德国士兵（Hun）仍然有很深的敌意，他的老师非常愤怒，好在校长庇护了他。而他后来在伯克利演讲关于威廉·莫里斯与瓦格纳的题目时，突然回忆起小时候家中悬挂的莫里斯的画，这让他坚信，他的研究与他的出身无法分离。或许本书就是这样一种刺激的结果，19世纪的维也纳，在他看来，“如果说什么地方能被说成是代表作为20世纪开端的西欧精神世界的话，那么，它就是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



沃格林的《没有约束的现代性》(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4月)也终于翻译出版,该书虽然只不过是《沃格林全集》中的一卷,但是该卷主要是关于译者张新樟所一直关心的灵知主义,所以才会单单挑出此卷翻译出版。不过据沃格林自己晚年的回忆,该卷中的《政治的宗教》一文可以略去不看,因为他对于这篇早期作品极为不满,对于不熟悉沃格林思想的读者来说,这种提醒当然是极为必要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又有了一个新的译本,前有王晓朝的全译本(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但是似乎坊间对此有些异议,此次由哈佛毕业的人类学博士吴飞直接从拉丁语移译的《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上)(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1月),应该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译本。如果说到上帝,那么接下来不得不提到自然法,最近出版的弗因德里希·罗门的《自然法的观念史与哲学》(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5月)则在某种意义上补了一个“自然法”的缺,不过我仍然期待那本由台湾联经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A.P. d'Entreves的《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这本薄薄的小册子至今仍然是自然法研究的经典,我当年偶然在折扣书店里发现该书后一直爱不释手,可惜国内却一直没有引进该书,或许算是一大遗漏。

六月的上海梅雨季节终于来临,独听雨声手捧卷的生活或许不能久过,7月开始,上海交响乐团将有一个大提琴节的系列活动,其中包括国际名家Majsky都将来沪亮相,听乐的生活或许可以作为7月的主题活动。不过在这之前,读读其他人的乐评应该可以为7月的音乐演出季暖暖身。



三联书店最近两年推出了一个系列的“音乐生活丛书”,选目相当精彩,如《萧翁谈乐——萧伯纳音乐散文评论选》(三联书店,2005年)、《在音乐与社会中探寻——爱德华·萨义德、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谈话录》(三联书店,2005年)都是当中的佳品,最近这个系列推出了由英国著名乐评专栏作家诺曼·莱布雷希特的《音乐逸事》(三联书店,2007年3月),实在是一本极佳的马桶或床头读物,因为里面是上百个关于音乐家的小故事,你不用担心从萧斯塔科维奇读到巴赫会产生时代错乱的幻象,也不用象担心要正襟危坐欣赏他们的作品那样去阅读关于他们的八卦。这一系列中的《伟大作曲家的生活》(三联书店,2007年1月)相比《音乐逸事》而言严肃不少,但是对于试图了解作曲家的音乐与生活关系的乐迷而言,这本书当然值得一观,当然期望不可过高,如诺贝特·埃利亚斯的《社会学视野下的音乐天才:莫扎特的成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那样的经典分析,还是较为稀少的。

在这个梅雨天的气候中,读读趣闻方可消解心灵的闷热之气。另外一本要推荐的依旧是老乐迷辛丰年的《如是我闻》(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5月),这本10年前出版过的谈论文集今天得以重版,自然是群众中有某种需求的呼声,书中的文章大多是当年在《读书》杂志上刊登过,最近《读书》杂志换班子的传闻沸沸扬扬,八卦漫天飞。掐指一算,这本文集中的精彩文章大多还是在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在《读书》上发表的。作为当年的《读书》迷和乐迷而言,在《爱乐》杂志不断改版、《读书》杂志削减乐评的情况下,未免还是存有几份遗憾和无奈。

(补注:由于本文撰写于2007年7月1日之前,其中《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世纪末的维也纳》系出版社赠书,特此说明。)

HISTORY&CULTURE 文史

观察员 王晓渔 (上海, wxy1978@hotmail.com)

六月是残忍的季节,如果阅读也有黄历,宜读史。余世存《非常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存有一处细节:一位老师请学生举出一次人生最伤心的经验,半天无人应答,后来一个女生站起来,慢慢地说:“读中国近代史的时候。”对此我亦有同感,但我之伤心,不是因为近代中国倍受凌辱,而是因为近代史惨不忍睹。至少我所读过的近代史课本,无一字没有问题。有人主张反过来读,“反着读”或许比“正着读”更接近史实,但这种颠之倒之的思维,正是我所力图避免的。所以,要想接近历史没有捷径,只有尽可能地多看资料。

1950年代,中华书局曾经出版“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后来纳入“清代史料笔记丛刊”。近代史一般从1840到1949年,清代则是到1911年为止,这种调整意味着1911到1949年的史料笔记被排除在出版之外,究竟“是何居心”,不敢妄加揣测。

后来上海书店出版社推出“民国史料笔记资料丛刊”，近日中华书局又决定恢复出版“近代史料笔记丛刊”。两套书中有重复选题，比如汪康年《汪穰卿笔记》，但只是个别现象。从已出书目来看，这套“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有众多关于北洋政府的记载。20世纪最无争议的阶段大概就是北洋时期，国共均极尽批判之能事，此套丛刊也有相当一部分以国民政府的立场观看北洋政府，所以并无新鲜之感。从我所接触的资料来看，北洋时期固然不是黄金时代，却也不应众口烁金、积毁销骨。自1966年至1987年，台湾文海出版社曾经约请沈云龙先生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历时21年，共计870种、1181册，不知这套丛刊能否陆续或者选其精要引入大陆？

从理论上说，阅读研究著作要比阅读原始资料节省时间，因为研究者的任务之一就是辨析资料。但从现状来看，很多研究著作不但难以明辨是非，还成为烟雾弹，增加了读者接近事实的难度。杨奎松先生的著作不在此列，《开卷有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是一本文集，基本每篇评述一本同行的专著，堪称专业书评的范本。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他对一些史实的辩证，比如《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可以用“精密”两字形容。杨奎松还在前言中提到茅海建险些因为《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1995年）当不成教授，由此也可看出当下学术生态到了怎样一种地步，研究著作不如原始资料也就不奇怪了。



1993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唐小兵先生主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对20世纪中国文学名作进行重新解读，它与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更名为《灰阑中的叙述》）等冲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既有范式。可惜14年后才被引进大陆，由于其中很多文章已为大陆学界所熟知，现在这本书更多的是文献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本书现在出版“增补本”，还不如保持历史原貌。近年来，年轻一代的中坚力量几乎都把兴趣投射到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领域，文学非但不再是首选，甚至有被忽略不计的趋势。

一行的《词的伦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4月）收入了他的诗学批评文章，作者出生于1979年，但这本书放在任何一个年龄段作者的著作中，都不会逊色。这位在诗学上极富才情的作者，似乎也兴趣转移，不知道这是作者的遗憾，还是文学研究的遗憾。三级警督兼作家曹乃谦，因为马悦然的力推终于进入大陆读者的视野，一年之内出版《部落一年》（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年）、《最后的村庄：曹乃谦短篇小说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4月），我看了其中两本，读过《最后的村庄》感觉曹乃谦没有想象得那么好，读过《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又觉得他也没有想像得那么差。中国作家永远不缺乏素材，缺少的是把它们变成文字的能力。

江苏人民出版社近年来着力引进奥威尔，先后出版《巴黎伦敦落魄记》（2006年）和《向加泰罗尼亚致敬》（200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又推出多卷本奥威尔系列，先期出版的是《我为什么要写作》（2007年6月）和《英国式谋杀的衰落》（2007年6月），两本书装帧得非常舒服，可惜我已经有一卷本《奥威尔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重复部分太多，译者又都是董乐山，如果再买，就完全是买椟还珠了。从书目来看，还有一些此前尚未引进的奥威尔著作，比如《缅甸岁月》。这本书和黄仁宇的《缅北之战》（新星出版社，2007年4月）都姓“缅”，很容易混淆，而且二者都是作者出道之前的作品，读者以骨灰级粉丝为适，对于试图初步了解者不是首选。近年来上海译文出版社作了不少再版工作，比如刘炳善先生翻译的《伦敦的叫卖声》和《伊利亚随笔选》此前就由三联书店推出，最近推出的王道乾先生翻译的《驳圣伯夫》此前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同样的选本，同样的译者，不以内容取胜，而以装帧见长，这也说明部分读者对书籍的需求从“温饱”进入“小康”。



对于已经购买《罗念生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的朋友来说，《罗念生全集·补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是不可缺少的，就像你已经购买了杀毒软件，难道不让它升级么？补卷收有埃斯库罗斯悲剧三种、索福克勒斯悲剧一种、古希腊碑铭体诗歌选和一些散论以及自传。

同一天时间，好几位朋友向我推荐[美]卡尔·休斯克《世纪末的维也纳》（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赶忙从书堆里把它抽出，这本书曾由台湾城邦麦田于2002年推出，但译者不是同一人。第一章提及施尼茨勒，于是又找出[美]彼得·盖



伊《施尼兹勒的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1815—1914》（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仅这两本书加在一起就有七八百页，考虑到这与我近期的集中阅读计划有段距离，于是又把它们送回原处。

六月是残忍的季节，如果再读如许沉重的书籍，恐怕要“抑郁至死”。最后推荐桑格格《小时候》（新星出版社，2007年5月），从见招拆招（即《读库》主编张立宪，又称老六）《记忆碎片》（南海出版公司，2004年）以来，我就没有读过如此快意的关于青春记忆的文字。虽然通篇都让我发出阵阵笑声，有些句子也会让你在这个残忍的六月平添一份文艺青年的伤感，比如她这样写道：认真地舔一只甜筒，一圈一圈转着舔，看着它越变越小，觉得青春消失得真快。

（补注：由于本文撰写于2007年7月1日之前，其中《世纪末的维也纳》、《小时候》系出版社赠书，一行、桑格格系撰写者友人，特此说明。）

书评

社会理论的任务

书评人 羽良（北京，priestliu@hotmail.com）



1982年，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批判的社会学导论》出版。在这本被视为吉登斯重构社会理论基石著作的小册子结尾，提出了除极权主义政治控制起源问题之外的四组与人类解放密切相关的问题，即：有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自然在维持人类生存方面所能提供的资源问题；有关人种或种族压迫的问题；有关性别压迫的问题；有关国家权力的问题，包括暴力蔓延的问题。围绕着上述现代社会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吉登斯极富预见性的提出了当代社会理论的根本任务：激进的社会理论必须对世界民族国家体系有一个更充分的理解，而且，它的主要关切点在于支持各种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试图制止或完全瓦解那种视“威胁”为应对民族国家“无政府状态”的唯一手段的信念。

吉登斯的这一总结在当时并非首创。在法国，福柯（Michel Foucault）在法兰西学院1976年的授课时，提出了“必须保卫社会”的理论命题。在德国，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更早些时候将他的教授资格论文命名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与福柯的略带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激进姿态不同，哈贝马斯给他的论文留下了略显暧昧的结论，这一结论，正如潘斯基（Max Pensky）总结到的那样：“面对着战后福利国家的兴起，自由公共领域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逼迫下，被系统地关闭了自由、公开的集体商议和对复杂的社会政治过程进行控制的狭小空间。但哈贝马斯没有为当代社会如何抵制公共领域的衰落提供积极的建议。”

可以看出，深受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影响的一代欧洲学者，对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下的国家权力极速扩张感到了巨大的忧虑。在六十年代激进的欧洲学生运动退去之后，学院内文化左派的兴起只是放大了学术界面对资本主义改变世界磅礴力量的呻吟声，却完全没有积极的介入并改变世界的意图。而无论是涂尔干的社会理论还是马克思的革命哲学，都因为未能提出完整的国家理论而在现实世界面前失色。恰在此时，新一代的社会理论家们开始潜心构筑新的社会理论。不止是理论，更有野心勃勃的实践。

为了扭转悲观的情绪，吉登斯在《批判的社会学导论》一书中重构社会理论的第一步就是提出了他的“双重介入”概念，借以否定了以自然科学方法论研究“客观社会”的错误态度。从而为社会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实践注入了新的活力。吉登斯异常重视历史研究，他重构社会理论的起点，便是研究那些社会学与其他所有社会科学共同关心的核心问题。对社会理论的这

一批判，在日后更帮助他重建了社会学的国家理论。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随着英国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政府的上台，以市场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新兴右派力量占据了欧美政治主流。到了 1991 年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自由主义取得了世界性的胜利。但在吉登斯等当时新一代社会理论家看来，自由主义的胜利并不意味着自由世界的彻底来临，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的垮台，更多的是那些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极权国家的必然失败。真正的问题——如何遏制国家权力在公共领域的肆意扩张——并没有因为自由主义的胜利而得到解决。即便是推崇“小政府”的右派政府，也只是将政府干预同个人权利简单的联系起来，将集体主义同个人主义对立起来，将产权、个人权利和政治自由的希望，寄托于宪政政治对政府行政权力扩张的节制上。尽管自由主义学者对“小政府”主张的论证逻辑上几乎无懈可击，但是在相当程度上，“小政府”主张对于解决国家权力的扩张对公共领域的侵蚀问题，只是行政技艺上的权宜之计。或者说的更直白些，形式上的投票选举、代议制政府与宪政政治，只是人类社会所实现的民主政治的一部分而已。历史，并没有因为自由主义的胜利而终结。

就在自由主义取得胜利之后的十年时间里，南南差距不断拉大，民主政治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进，随着拉美和亚洲经济危机以及非洲地区的停滞不前而丧失了动力。乱开药方的世界银行，在全世界范围内撰写了一本市场自由主义的失败之书。无论是欧美国家，还是打着左派政治旗号的强人独裁国家，国家权力同公共领域的冲突有增无减。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令资本主义改变世界的图景更加明确的显现出来。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股新的，有别于自由主义“小政府”策略的，也更为根本的对抗国家权力扩张的力量出现了。这便是吉登斯在社会理论的根本任务中所提到的社会运动的力量。

是的，本质上，无论是吉登斯还是福柯，在他们深刻的认识到国家权力扩张和全球化过程中改变世界的资本主义力量之后所开出的药方只有一个，“以社会运动来对抗国家权力”。这是激进的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的一次合流。这一主张的预见性，在《批判的社会学导论》出版 16 年后，获得了一个更为现象化名字——以研究社会运动理论著称的美国社会学者迈耶 (David S. Meyer) 和塔罗 (Sydney Tarrow) 将他们合作主编的一本社会运动论文集命名为《社会运动社会》。“社会运动社会”这一概念，恰如其分的描述了战后至今，各国政府，无论民主与专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即，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和民族国家权力的双重夹击下，作为民主政治空间的公共领域并没有因为福利国家政策的社会赎买、集权政治的方兴未艾和金融资本主义的日臻成熟而消亡，相反，在应对资本权力方面，波兰尼 (Karl Polanyi) 所预言的社会的自救功能逐渐显现，而在应对国家权力方面，以环保运动和反全球化运动为代表的跨国社会运动网络已告成熟。更重要的是，与自由主义政治实践所必须的宪政环境不同，无论是社会自救还是社会运动，对不同的政体有着更为弹性和多变的适应能力和反应模式。

无论是在德国罗斯托克-海里根达姆的反 G8 峰会游行，还是厦门市民自发的抗议 PX 项目运动，自然，还有 2005 年香港世贸会议时韩国农民在维多利亚湾的悲壮一跳，无不昭示着社会运动社会对改变世界的潜力和能量。而吉登斯提出的“双重介入”（即，社会结构作为社会实践的中介，反过来其结果又为后者所左右）成为争取自由的人们积极改变世界面孔的理论钥匙。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社会理论的任务在于“在对世界民族国家体系有一个更充分的理解上，支持各种社会运动”。

[英] 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批判的社会学导论》，郭忠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年 4 月。

授权网络首发媒体: [学术中国·阅读在线](#)

授权纸面首发媒体: [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鸣谢: 季风书讯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阅读报告独立发行，欢迎订阅，谢绝转载。